

SENLIN YU FAZHAN

森林与发展

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

FEILUBIN SENLIN LANFA YANJIU

(1946-1995)

包茂红 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TH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森林与发展

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

RESEARCH ON LOGGING IN THE PHILIPPINES

(1945-1999)

王德明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 (1946—1995)

包茂红 著

责任编辑 周 静
封面设计 王 静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广门内大街16号)

网 址: <http://www.cesp.cn>

联系电话: 010-67127052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10-67122803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

各地新华书店 经

2008年1月第1版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787×960 1/16 开

11.52 页

250千字 字

28.00元 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森林与发展: 1946—1955: 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 /
包茂红著.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209-686-8

I. 森… II. 包… III. 森林—滥伐—研究—菲
律宾—1946—1955 IV. S7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2816 号

责任编辑 周 煜 王婷婷
封面设计 王筱婧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翻印、转载,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内容提要

森林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森林滥伐不但破坏了人类现在尚不能摆脱的生态环境，而且削弱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使人类文明面临难以为继的危险。菲律宾的森林滥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对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具体的分析，提出了“木材生产和贸易说”、“人口增长压力说”、“政策失误和政治腐败说”等解释，本书从环境史的宏观大视野来综合分析森林滥伐问题，提出导致森林滥伐的主要原因是菲律宾片面的发展战略的新观点。

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直接参与者是木材采伐公司和从事农业活动的山民，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他们就是导致森林滥伐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从事经济活动的，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采伐和出口自然资源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外汇，对农村的忽视必然导致许多贫困化的农民被迫迁移到山地林区。因此，片面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才是造成森林滥伐的根本原因。林业政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上也鼓励了森林滥伐。尽管它对森林采伐也有某些限制，但在执行过程中完全被扭曲，不但出现“政府失灵”，也产生了“市场失灵”。因为，菲律宾独特的历史文化使之形成了既是弱国家也是弱社会的“密友资本主义”。菲律宾的发展战略是战后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内民族主义者要求用经济发展来巩固政治独立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个战略在引导菲律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资源枯竭和发展停滞的现实迫使菲律宾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国际林学和环境保护的时代潮流也从先前忽视当地人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林学向重视当地人参与的可持续林学转化。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菲律宾企图以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来弥补以前森林滥伐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实践证明，森林虽然从理论上讲是可再生资源，但在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它变成了不可再生资源。菲律宾必须实施把环境纳入其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菲律宾森林滥伐的教训对我国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的研究也昭示我们，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至少是不全面的，历史研究需要融入环境史的新思维，进而编撰出新型的历史。

Abstract

Fore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eco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forestation has not only destroy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humankind has to depend upon, but has also undermined and interrupted human development. Prior inquiries into deforest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have primarily been auth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 number of subdisciplines. This thesis developed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data from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erspective and argues that a one-sided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led to deforest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lthough timber companies and upland farmers were the direct practitioners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ey were not the main factors in the resulting deforestation. The primary cause was in fact the one-sided “growth-answers-everything”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dictated the removal of tre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widden and prominent agricultural societie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economic strategy, forest policy was form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modern forestry and with an emphasis on maximizing productivi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est policy was distorted in the circumstance of a traditional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Both the weak state and society coupled wi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failures characterized the practice of “Crony Capitalism” in the postwar Philippines.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Philippines must rethink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onsequences of deforestation are widespread and reverberate throughout the globe. With the decline of forests, the stag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hift of focus regarding forestry from economic value to a mixture of economic, aesthetic, and social values, the Philippines launched programs urging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reforest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se efforts, they were not able to reconstruct the forest environment in the Philippines. Theoretically the forest is renewable;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in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Philippines. In order to bring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to perfect harmony, the Philippines must abandon its former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ush forward the ide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ountry poor in forest resources, China could draw a lesson from deforest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study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anthropogenic history is neither complete nor reasonable. A new history must be writte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that adopts the recent thinking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is kind of history will be described in four contexts, specifically in the loc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contexts.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森林滥伐释义.....	2
第二节 森林史学简史.....	4
第三节 森林滥伐史研究的批评性回顾.....	7
第四节 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和分析框架.....	13
第五节 方法论.....	16
第六节 资料的收集与处理.....	20
第七节 本书的章节安排.....	23
第二章 菲律宾的森林滥伐及其影响.....	24
第一节 菲律宾林地和森林的分类.....	24
第二节 独立前菲律宾的森林减少.....	26
第三节 独立后菲律宾的森林滥伐.....	30
第四节 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环境影响.....	35
第五节 菲律宾森林滥伐的人文代价.....	39
第三章 木材贸易与菲律宾的森林滥伐.....	45
第一节 菲律宾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47
第二节 菲律宾对日本的木材出口.....	51
第三节 菲律宾木材采伐公司的森林滥伐.....	57
第四节 日本对菲律宾的环境援助.....	60
第五节 对“生态阴影说”和“横向压力理论”的辨析.....	64
第四章 移民农业发展与菲律宾的森林滥伐.....	66
第一节 菲律宾人口的增长及其密度.....	67
第二节 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移民.....	69
第三节 贫困人口向林地的迁徙.....	75

第四节 移民农业与菲律宾的森林滥伐.....	78
第五节 对“轮耕导致滥伐叙述”的解构.....	82
第五章 林业政策和菲律宾的森林滥伐.....	88
第一节 菲律宾森林管理机构的沿革.....	89
第二节 菲律宾林业政策的演变.....	92
第三节 政治经济寻租与森林管理能力的弱化.....	102
第四节 菲律宾森林政策扭曲的大背景:“密友资本主义”.....	108
第五节 弱国家、弱社会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	113
第六章 菲律宾的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	117
第一节 菲律宾地方性森林知识的断裂与延续.....	118
第二节 菲律宾的森林保护:从择伐到保护.....	123
第三节 菲律宾的植树造林:从工业林种植园到社会林业.....	126
第四节 菲律宾造林的成果与可再生资源破坏的不可弥补性.....	134
第七章 结论和启示.....	138
译名对照表.....	143
西文参考书目.....	150
中文参考书目.....	165
相关网站.....	168
后 记.....	169

第一章 导 论

森林号称“地球之肺”。它在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滋养人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森林具有多方面的生态价值，主要包括固碳制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景观游憩基地等。森林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不仅是当地古老民族生存的摇篮，也是所在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①森林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树叶蔽身，摘果为食，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农耕文明时代，森林不但提供了食用产品、建筑材料，还为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燃料薪材，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此同时，在许多文明发达地区由于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当地气候干化，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文明发展的断裂。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以后，虽然多次发生能源革命，但森林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森林产品特别是木材完全被商品化。随着殖民者落脚世界各地，殖民宗主国控制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森林资源，并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木材市场和贸易体系。“非殖民化”运动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带国家虽然赢得了独立和主权，但由于受到不平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制约，在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保护政治独立的良好愿望指导下，积极开发和出口本国丰富的森林资源，希望能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提供原料和资金支持。但是，无节制的森林滥伐和出口木材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还引起了一系列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有些国家甚至因此而发生了工业化枯竭、民族国家分裂、和少数民族灭绝的现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热带森林滥伐问题逐渐引起了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① 参看 John Perlin, *A Forest Journey: The Role of Wo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bert Pogue Harrison, *Forests: The Shadow of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第一节 森林滥伐释义

森林滥伐(Deforestation)是一个复杂的、现在仍有争议的概念。从广义来看,森林滥伐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特定的森林区域,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造成森林树冠覆盖率的暂时或永久下降、甚至完全被取代。在这个定义中,造成森林滥伐的原因既包括诸如采伐木材、烧荒等人类活动,也包括像林火一类的自然因素;森林滥伐的范围也比较宽泛,既包括森林植被被完全清理并代之以其他土地利用形式,也包括森林植被覆盖率的暂时或永久减少。具体而言,就是指森林覆盖率的下降超过了森林的自然恢复率,森林的树木构成、密度、质量以及林中生物总量都遭受影响,使森林难以自然恢复到正常状态,难以进行可持续生产。^①这个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宽泛。狭义的森林滥伐概念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这个定义目前似乎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它认为,森林滥伐就是“完全清除了各种形式的树木(不论是郁闭林,还是开放林),并且代之以其他非森林的土地利用方式”。^②这个定义包括两个前后相连的过程:一是以超出自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幅度采集木材和其他非木材林产品;二是清理森林植被代之以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在这两个过程中,前者是先导,后者是关键,缺一不可。这意味着择伐森林就不是森林滥伐的一部分,因为它只引起森林成份和结构的暂时渐变,并未造成向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型。另外,林火、台风等自然现象造成的森林植被消失也不能算做森林滥伐,因为它们既不是人们采集木材的活动,也没有用另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取代森林生产。从对森林滥伐情况的实际技术测定来看,现在普遍采用的航拍或卫星成像技术能够非常清楚地展现森林滥伐的情况,但对树冠覆盖率的变化只能反映个大概。另外,从环境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后一个定义更为贴切。因为环境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③森林史作为环境史的一部分,自然也主要研究人类及其社会与森林相互作用的历史,森林滥伐史主要研究人为因素造成的森林覆盖被替代的历史。从菲律宾森林史来看,这个定义涵盖了战后菲律宾森林滥伐的各个方面,为全面研究菲律宾的森林滥伐史提供了非常合适的基本概念。

用这个定义来衡量,当今世界和菲律宾的森林滥伐情况都非常严重。就全球森林覆盖率而言,要得到一个准确数据是非常困难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根据各国提供的、

^① 正常或合理的利用森林资源是把采伐量控制在森林生态系统可以自行恢复的范围之内。森林滥伐是最极端的、或毁灭性的森林利用方式。

^② FAO, *Forest Products Yearbook: 1988*,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90.

^③ 参看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1948—1976 年的书面资料清单列出了全球和区域的森林概况以及森林滥伐率,但是,由于各国对森林、森林滥伐等采用了不同的定义和分类,这个概况并没有反映森林滥伐和森林管理水平变化的真实情况,相反它更多地反映了不同国家数据库的质量的变化。^①这种情况在 1981 年后发生了根本变化。从 1978 到 198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在“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框架内,使用卫星、雷达成像和航拍技术,对全球热带森林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②此后的数据相对来说由于标准一致而比较可靠、具有可比性。全球原有热带雨林约 16 亿公顷,从 1960 年到 1990 年,总共损失了 4.5 亿公顷,而且森林滥伐率一直逐年增长,1980 年代的森林滥伐率比 1970 年代末的要高出 36%。^③估计现在全球热带森林每年的损失率在 0.8%~1.8%之间。^④尽管森林滥伐仍在加速发展,但全球仅有不足 10% 的雨林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热带森林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菲律宾的森林滥伐更为严重。1948 年,菲律宾的森林覆盖占国土面积的 59%,^⑤1987 年下降到 22.2%,^⑥最厉害的是 1976—1980 年,年均森林滥伐率高达 3.6%。^⑦

森林滥伐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损害。森林滥伐必然弱化其固碳功能,引起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出现促使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增加降水 7%~15%,进而导致全球生态和生产格局发生紊乱。据估计,在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诸因素中,森林滥伐发挥了 30%~50% 的作用。^⑧森林滥伐导致林地土壤养分流失,紧实度和容重增大,土壤侵蚀加剧,阻截降水能力下降,地表径流系数加大,容易发生洪水泛滥。森林滥伐还会恶化许多珍贵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热带雨林虽然大约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8%,但却是全球 60% 的动植物的家园。菲律宾的动植物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它位列全球十个需要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的前列。^⑨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内部结构,也削弱了工业、农业和现代医药业的生物遗传基础,对

① 对此时全球热带雨林的面积和损失率的估计是大不相同的。比较典型的几种说法是:索默尔认为,1970 年代中期全球热带雨林是 9.35 亿公顷,比以前减少了 40%,年损失率是 1.2% (达 1100 万公顷)。A. Sommer, "Attempt at an assessment of the world's tropical forests", *Unasylva*, 28, No.112-113, 1976, Pp.5-25. 兰利和克莱门特认为,每年的损失率是 560 万公顷,不过,这里仅指被永久清理的森林。J. P. Lanly & J. Clement, *Present and Future of Forest and Plantation Areas in the Tropics*, Rome: FAO, 1979. 梅耶斯认为,每年的损失面积是 2000 万公顷,这个数据中包含了森林滥伐和择伐造成森林退化两部分。N. Myers, *Conversion of Tropical Moist Forest*, Washington D.C.: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1980.

② FAO/UNEP, *Tropic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 Project*, Rome, 1981.

③ FAO, *Forest Products Yearbook: 1991*, Rome, 1993.

④ WRI, *World Resources: 1996—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Florencio Tamesis, "Philippine forests and forestry", *Unasylva*, Vol.6, 1948, Pp.316-325. FAO, *Forest Resources of the World*, Washington D. C., 1948.

⑥ Philippine-German Forest Inventory 1988, 转引自 Forest Management Bureau, *Forest Resources*, Manila, 1988.

⑦ David M. Kummer, "Measuring forest decline in the Philippines: An exercise in historiography", *Forest & Conservation History*, Vol.36, October 1992, P.186.

⑧ 侯元兆等编著,《热带林业:基础知识与现代理念》,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 年。

⑨ Gerhard Martin Van den Top, *The Social Dynamics of Deforestation in the Sierra Madre, Philippin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1998, P.19.

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威胁。

第二节 森林史学简史

森林虽然与人类文明的演进关系密切,但是对全球热带森林史尤其是森林滥伐史进行专门的研究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正如库默尔教授所说,在1990年代以前,探究导致热带森林滥伐的原因这类问题几乎没有得到重视。尽管里查兹和塔克教授在1980年代出版了这一领域的拓荒性著作,但热带森林数量减少的历史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①这种说法表面上看与热带森林史的研究状况比较吻合,但问题在于没有把它置于森林史研究的整体中来观察,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世界森林史和热带森林滥伐史研究的历史。另外,它仅仅是从美国的学术史中总结出来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把眼光放深邃,就会发现,森林史研究已有悠久的传统,热带森林滥伐史研究是森林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早在14世纪,皮特罗·德·克里申齐的著作《农书:十二卷》中就记载了罗马人有关林业、农业、狩猎、渔业和园艺的知识,这是森林史最早的萌芽。在德国,弗里德里希·斯蒂瑟在1737年出版了有关森林史的著作《德国的森林和狩猎史》,1816—1818年在“塔兰特林学院”设立了森林史讲座。此后陆续出版了多部有关森林史的著作,但这些著作都把森林史与狩猎史放在一起考察,或者仅仅把森林史当成是其他历史活动的铺垫。直到意大利史学家阿多尔夫·迪·拜伦格尔在1859—1863年出版了《古代意大利林业的法律和历史》一书,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从此以后,森林史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拜伦格尔描述了罗马帝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的森林史,涵盖了在他那个时代被认为与林业相关的所有内容,包括森林用途、森林技术、造林学、森林管理、森林法规,和与森林有关的植物学、生理学、病理学、动物学等知识,以及与森林有关的农业、牲畜饲养、狩猎、森林公园、造船等行业。这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整体论观点不但昭示了今后森林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也展示了它与当时的自然史研究的重要区别。^②不过,森林史研究并未在意大利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却在拜伦格尔的祖籍国法国和他受教育的欧洲德语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在19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自然环境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把环境看成是静止不变的、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因素。^③1962年,受南茜大学文学院设立森林史课程和研究小组的影响,《法国森林杂志》出了一辑森林史专刊。在德国,

^① David M. Kummer, "Measuring forest decline in the Philippines: An exercise in historiography", P.185.

^② M. Agnoletti & S. Anderson ed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Forest History*, CABI publishing, Oxon, UK, 2000, Pp.1-2.

^③ 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高毅译,《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弗莱堡大学林学院在 1943 年成立了森林史研究所。1951 年,德国森林史学家冯·霍尔斯特因就森林史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概念框架,例如他区分了“森林史”(Waldgeschichte)和“林业史”(Forstgeschichte)的概念。在他看来,森林史研究应该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研究森林植被变化;第二层是研究生态演进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等。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也成立了自己的“森林史学会”(1946 年,最初的名字是“林产品史基金会”,隶属于“明尼苏达历史学会”),专门研究森林及其保护史,出版《森林史杂志》,后来改名为《森林与保护史》。1996 年,“森林史学会”与“美国环境史学会”合并,《森林与保护史》与《环境史评论》合刊为《环境史》。战后森林史研究的大发展不仅展现了它在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上的逐步完善,还预示着它将冲破只研究温带发达国家森林史的人为藩篱,开始进入热带发展中国家森林史的研究领域。

森林史研究真正国际化的标志是“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简称“国际林联”: IUFRO)在 1963 年成立了专门研究森林史的国际研究小组。^①1979 年在南茜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森林史研讨会上,学者们开始讨论热带森林问题。1981 年,国际林联中形成了专门研究热带森林史的工作小组。该小组组织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协办)专门研讨了亚洲、大洋州和澳洲的森林史;第二次会议(由美国森林史学会协办)专门研讨了拉丁美洲森林史。1986 年,国际林联成立了第二个有关热带森林史的小组,专门研究木材贸易和木材工业史。1998 年,该小组改名为“森林的经济和社会史”,这意味着对热带森林的研究已从生态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转向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从单个民族国家或地区森林史研究转向跨国家和全球林产品市场的研究。^②热带森林史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都大大向前推进了。

虽然冯·霍尔斯特因早在大约 50 多年前就已预言森林史应该研究人类活动与森林生态变迁的关系,但是由于那时森林史赖以为基础的生态学仍然把这两者看成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很少意识到人的作用是造成生态演进的关键因素,因此森林史受传统景观生态学的影响主要还在研究森林植被的历史进化。^③不过,这种情况在奥都姆 1959 年出版《生态学基础》一书后逐渐发生了变化。奥都姆认为,生态学就是植物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人类及其社会在生态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④把

^① M. Agnoletti & S. Anderson ed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Forest History*, P.4. 国际林联创建于 1890—1892 年,此后不久就在德国的埃伯斯瓦卡德成立了林业历史学组(Group 6.07 Forest History)。不过,那时的国际林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主要由欧洲林学家组成。林业历史学组也只是欧洲部分国家森林史学家的兴趣小组。参看《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农业出版社,1989 年,第 134 页。

^② M. Agnoletti & S. Anderson ed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in Forest History*, P.6, P.26.

^③ 以前的森林史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一是保护森林资源的视角,主要研究森林资源的消长与演替;二是林业方针政策的角度,主要研究林业发达国家的林政史;三是科技史的角度,利用树木年轮研究气候变化、火山爆发、空气污染等环境变化;四是思想文化视角,研究森林文化和林业思想。《国外林业史研究管窥》,《世界林业研究》,1992 年第 2 期,第 94 页。

^④ E·P·奥德姆 著,孙儒泳 等译,《生态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

人类活动与森林环境变迁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联系起来的是生态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以及政治生态学等。

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cology）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 S·迪维在 1970 年代初提出的。历史生态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应该为森林变迁负主要责任，历史事件而非自然进化事件是造成人类社会与森林环境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①历史生态学区分了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历史事件和自然现象的不同，给人类发展与森林环境变迁的关系赋予了历史感和社会性，显然比以前的“环境决定论”、“环境无用论”、和“环境可能论或或然论”更切合森林史的实际。对森林史研究的发展来说，历史生态学的贡献在于既提供了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叙事模式，使森林史研究超越了仅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分析工具的传统，又使森林史研究从先前只注重森林植被变迁史向重点研究人类活动与森林环境的关系史转型。

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就是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人类问题，尤其重视用人口与资源的比例这一概念系统解释人类文化的特点。^②人作为动物群的一部分，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与其他因素相互联系和依赖，并形成自己的文化特点。这些特点发挥作用实际上就是维持对生态系统内各变数的适应和改造能力。所以，一方面，人类文化是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人类文化的建构。生态人类学给森林史研究的启示是，森林环境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文化建构。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与生态人类学的不同在于：人类生态学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开放的系统，这两个领域之间通过能量、物质与信息的输入与输出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联合的整体。^③自然系统的变化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物质和能量流动、生物区的变化、和生物圈自然结构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可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即诸如土地利用和工业这样的经济活动、诸如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规定这样的人类社会制度、以及人类的行为方式。这些变化通过移民等人类扩散活动而相互交织在一起。人类生态学从更广泛的视角深入分析了人类生产活动、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对森林环境变迁的影响，把社会经济因素引入森林史研究。

环境经济学（Environmental Economics）兴起于 1970 年代初，它利用现代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来解释环境问题。它认为，环境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经济发展既依赖环境，又会造成环境恶化。造成环境恶化的经

^① W. Balee, "Historical ecology: Premises and postulates", in W. Balee ed., *Advances in Historical Ec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 著，郭凡、邹和 译，《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 年。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冢柳太郎 编著，范广融，尹绍亭 译，《生态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③ A. T. Rambo,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Human Ecology*, Honolulu: East West Environment and Policy Institute, 1983. Bernard Campbell, *Human Ecology: The Story of Our Place in Natur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Aldine De Gruyter, 1995.

经济学原因是成本和收益、稀缺和价格、权利和义务、行为和结果的脱节或背离。这种脱节或背离是由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或两者都失灵造成的，因为在现行价格体系中，许多环境因素没有被估价或估价被扭曲，造成生产成本不实或被在人际间或代际间转嫁。要想治理环境问题，就要对资源进行合理估价，进而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经济 and 环境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①对于森林史研究来说，环境经济学把森林产品纳入经济运行过程中，既看到了森林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也认识到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对森林环境的冲击和影响。

政治生态学 (Political Ecology) 主要研究政治和权力关系对环境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和利用的影响，突出的是不同阶层的人在资源消费和生产、在环境与发展关系处理上的矛盾与冲突。环境破坏的直接责任人往往是处在生产第一线的穷人，但是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推力来自统治阶级和国际市场。进而言之，由于权力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所以财产权、自然的资本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新社会运动、市民社会的形成、环境正义运动、地方性知识与“标准知识”或“标准智慧”的斗争都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应有之义。^②政治生态学给森林史研究注入了政治的向度，把森林环境的变化与权力关系联系起来。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的深化和交叉为森林史研究把人类社会与森林环境联系起来思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把森林史从开始时仅仅研究森林植被变迁的历史发展到了研究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与森林的关系史。

第三节 森林滥伐史研究的批评性回顾

上述分支学科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森林史的研究范围，为从不同侧面研究森林史开辟了可能。研究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对人类活动与森林关系的更精细、更准确的把握。从这些视角出发研究热带森林滥伐史就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大致可概括为：人口增长压力说，木材生产贸易说，林业政策鼓励说，行政不力和政治腐败说等。

人口增长压力说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存在着耳熟能详的“西蒙/艾尔利西争论”。艾尔利西认为，地球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对

^① 戴维·皮尔思，杰瑞米·沃福德 著，张世秋 等译，《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张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 Piers Blaikie and Harold Brookfield eds., *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 Methuen, London, 1987. Richard Peet and Michael Watts,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vemen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